

#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评析\*

黄 忠 唐小松

**[内容提要]**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周边国家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主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抓手是拓展人文交流。中国自身在周边公共外交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清楚周边公共外交的理想追求、在文化层面尤其是价值观方面的公共外交有着诸多误区以及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为此,中国应当勇于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指明其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破除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误区,创新文化沟通思维,发展共同价值观;摆正心态,优化周边公共外交的整体布局,壮大公共外交发展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中国 周边公共外交 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6)06-0140-09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6.06.019

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相关研究工作仍显滞后,满足不了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明确周边公共外交的特征,认清最新的形势与问题,提出更为科学的周边公共外交实施建议。

## 一、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特征

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立足于中国的周边形势,放眼全球,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的整体要求,就目标、主题和抓手而言,有以下一些特征:

### (一) 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主要目标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宏大构想,也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在 2015 年第七十届联合

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应“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①</sup>。就具体路径而言,只有在实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由蓝图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提升中国在周边国家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

\*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5AGJ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参见人民网 2015 年 9 月 2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

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非常重要。<sup>①</sup>这就决定了当前中国周边公共外交应将主要目标集中在周边国家的人民中塑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并躬身亲为。2013年,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人民要与印尼人民“开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夯实双方关系的社会土壤”。<sup>②</sup>2015年,他又利用亚洲博鳌论坛这一重要公共外交平台,呼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③</sup>。海外许多媒体就此认为:“‘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合作共赢、政治互信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之道”,它在中国与邻为善、互惠互利的周边外交中得到了充分展示。<sup>④</sup>与此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学术团体与民间组织等诸多群体也都就“命运共同体”大力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并且得到了外界诸多方面的积极回应。

## (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主题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周边地区的顶层设计,也是当前周边公共外交的主题。如果说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在理念层面对于世界秩序的价值追求,那么“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在实践中为世界发展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它为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物质支撑。在周边地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否建成,关键要看“一带一路”能否在周边地区落实。而在“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这五大内容中,“民心相通”起着社会根基的作用,这也是周边公共外交的重要发力点。<sup>⑤</sup>

围绕“一带一路”,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正从“传播丝路文化、讲好丝路故事、阐明丝路精神”三个角度展开工作。<sup>⑥</sup>习近平在亚洲博鳌论坛中专门强调“一带一路”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它“秉承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sup>⑦</sup>2015年11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访问马来西亚前夕,专门在马来西亚媒体撰文,阐述“郑和七下西洋、五到马六甲”的故事,点明“真诚、友好、互利、共赢”是“郑和时代就已开启的中马关系历史航道”。<sup>⑧</sup>23日,他又专程访问了马六甲的郑和纪念馆,与当地民众互动,强调要继承和发扬郑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包容的精神理念”<sup>⑨</sup>。中国社会各界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公共外交活动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从外界的反应看,在2015年,“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外媒高度关注的热词,有关报道量上升,深度也有所增加,新加坡《联合早报》更是将之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sup>⑩</sup>。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围绕“一带一路”所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影响力。

①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参见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②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网站2013年10月3日,http://www.fmprc.gov.cn/ce/cesg/chn/dttx/t1084354.htm。

③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参见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④ 李筱竹、渠鸿儒等《外媒热评“习式外交”:命运共同体体现和平发展之道》,参见国际在线2015年8月13日,http://gb.cri.cn/42071/2015/08/13/7651s5065417.htm。

⑤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参见新华网2015年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8/c\_1114793986.htm。

⑥ 王义桅《丝绸之路公共外交的使命》,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4年第7期。

⑦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参见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⑧ 李克强《历史的航道 崭新的坐标 扬起的风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网站2015年11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ce/cemy/chn/sgxw/t1316668.htm。

⑨ 《李克强到访马六甲 强调继承郑和精神、倡导和谐包容》,参见国际在线2015年11月23日,http://gb.cri.cn/42071/2015/11/23/7551s5173948.htm。

⑩ 《外媒点赞“一带一路”大盘点》,参见中国日报(中文网)2015年7月29日,http://china.chinadaily.com.cn/2015-07/29/content\_21437486.htm。

### (三) 拓展人文交流是主要抓手

人文交流在中国周边公共外交中被赋予特殊意义。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明确要求“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sup>①</sup>。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也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应“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凝聚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sup>②</sup>。

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2013年6月,中韩两国元首共同决定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这一政府间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指导执行相关的工作。2014年7月,两国元首再次“商定共同努力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打造成为加强两国人文纽带的重要平台”<sup>③</sup>。中俄人文合作机制也已经非常成熟,最近的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会议都由两国的副总理级别领导共同主持召开。俄罗斯副总理戈洛杰茨表示,“俄方对两国人文合作水平感到满意”,刘延东副总理则认为,“中俄人文合作正成为大国间文明对话的典范”。<sup>④</sup>此外,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东盟文化部长会议”,对南亚国家设立了“中国—南亚人文交流计划”,与中亚国家则重点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开展人文交流,等等。

青年和留学生群体在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中受到了特别重视。中韩两国有稳定的青年交流项目与青年领导者论坛项目<sup>⑤</sup>;中俄两国则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连续组织了“青年友好交流年”活动,力争在2020年双方互派的留学生达到10万人<sup>⑥</sup>;习近平对于“有1.4万名越南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也有三四千中国留学生在越南学习生活”感到欣慰<sup>⑦</sup>;在南亚,中国计划自2014年起“提供1万个奖学金名额、5千个培训名额、5千个青年交流和培训名额”<sup>⑧</sup>,等等。

## 二、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形势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社会的转型正相伴而生。<sup>⑨</sup>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困境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困境主要表现

有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对其霸权地位产生了焦虑,担心中国会取代其全球主导地位;二是周边国家对自身安全感到疑虑,担心中国会威胁其生存;三是西方文明在面临合法性危机之时,忧心被中华文明的复兴取而代之。结果就是,美国开启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在亚太地区构筑围堵中国的体系;周边的诸多国家虽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但在安全上却越来越指望美国;在全球社会,价值观外交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崛起的道统在周边地区同样受到质疑。

### (一) “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地区仍有一定市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不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西方基于理性人假定而得出的现实主义“均势”思维在周边国家社会仍根深蒂固,加上区外国家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仍将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①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参见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②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参见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7/c\_1117071978.htm。

③ 《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首尔举行》,参见国际在线2013年11月19日,http://gb.cri.cn/42071/2013/11/19/6071s4327276.htm;《2014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参见新华网2014年7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3/c\_126707363.htm。

④ 《刘延东:中俄人文合作正成为大国间文明对话的典范》,参见国际在线2014年9月15日,http://gb.cri.cn/42071/2014/09/15/7551s4692486.htm;《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在西安举行》,参见新华网2015年10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10/09/c\_1116773102.htm。

⑤ 赵成《中韩青年交流合作项目播撒中韩友谊的种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1月5日,http://www.cssn.cn/gj/gj\_gjzl/gj\_ggzl/201511/t20151105\_2559238.shtml。

⑥ 《刘延东:中俄人文合作正成为大国间文明对话的典范》,参见国际在线2014年9月15日,http://gb.cri.cn/42071/2014/09/15/7551s4692486.htm。

⑦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在越南国会的演讲》,参见新华网2015年11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6/c\_1117067928.htm。

⑧ 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参见新华网2014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9/c\_1112539621.htm。

⑨ 王义桅《中国梦:破解后崛起时代的道统性难题》,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3月(上)。

“权力政治”思维对于“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负面解读与影响比比皆是。日本《外交官》杂志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反制”美国战略东移政策的具体措施,表明了中国想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占据领导角色;《产经新闻》网站报道,中国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想要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地区秩序。<sup>①</sup> 印度担心中国进入印度的“南亚后院”可能会给它在印度洋的战略安全带来隐患。<sup>②</sup> 柬埔寨焦虑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会“引发中日和中美之间的竞争与角逐”,自己则“成为地缘政治牺牲品”。<sup>③</sup>

在“权力政治”思维下,朝核、钓鱼岛、南海与反恐等周边热点问题对于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挑战则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一带一路”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在这些安全问题得以稳定的形势下方可实现。不仅如此,相对于发展,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和脆弱,也更容易吸引舆论的眼球。然而,在这些议题中,中国都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屡屡被指责“纵容”朝鲜政权,钓鱼岛成了渲染中国威胁的“抓手”,“南海”行动被夸大为破坏航行自由,等等。<sup>④</sup> 近期,中国一些合理合法的行为被解读为以牺牲周边国家利益为自己谋求安全的“强硬”,被认为“反映了中国对于即将消失的战略机遇期的担忧”,也被误解为是对世界秩序、地区稳定、海上公域(the Maritime Commons)和国家主权的挑战,他们还认为“默许和不作为”只会让中国更加肆无忌惮。<sup>⑤</sup> 更有舆论借助这些具体问题大做文章,渲染中国是亚洲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呼吁美、俄、印等国家在整个亚洲制造对中国“战略不信任”(Strategic Distrust)的氛围。<sup>⑥</sup>

观念层面的不信任不仅会强化周边地区的“均势”形势,更有可能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基于均势的考虑,多数周边国家既不希望中美关系太好以至于被联合控制,也不希望两国关系太差导致自己必须“选边站”,更不希望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棋子。<sup>⑦</sup> 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中国话语权弱势,“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极易被对手放大,从而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产生错误直觉,主动把自己绑在围堵中国的战车上。韩美决意部署“萨德”系统以及美国的航母舰队于南海仲裁案“判决”期间出现在菲律宾附近,不能不与此相关。

(二)美国、日本在周边国家的价值观攻势对中国形成的挑战

推广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普世价值观”一直被置于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日程中。在广播领域,以自由亚洲电台的2014年度项目为例,它的对象是中国、越南、朝鲜、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公众,主要内容是敏感的“政府腐败、强征土地、劳资对立、民族动乱、宗教迫害、环境破坏、人口贩卖、卫生风险和践踏人权”等议题。当年该项目有253名员工参与,使用了9种当地语言,覆盖了新旧媒体,实际耗资8396万美元。<sup>⑧</sup>

- ① Jin Kai, “Can China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November 28, 2013, see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3/11/can-china-build-a-community-of-common-destiny/>; 《外媒“一带一路”大构想推动亚洲共赢(2)》, 参见参考消息网2015年3月29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50329/722785.shtml>; Merriden Varrall, “Chinese Worldview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6, 2015, see from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ese-worldviews-chinas-foreign-policy>.
- ②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 ③ 王义桅《柬埔寨对“一带一路”的十大担心》, 参见观察者网2015年12月24日, [http://www.guancha.cn/WangYiWei/2015\\_12\\_24\\_345761.shtml](http://www.guancha.cn/WangYiWei/2015_12_24_345761.shtml).
- ④ 李成贤《中国“纵容”朝鲜的后果》, 载于FT中文网2013年2月27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137?full=y>; 李圣依《日华媒: 钓鱼岛成日渲染中国威胁的“抓手”》, 参见环球网2014年8月7日, <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4-08/5098433.html>; 刘海洋《美国南海“舆论战”技战术意图分析及启示》, 载于国际法促进中心网站2016年3月6日, <http://chineseinitiative.org/contents/4/284.html>; 李学华《西方舆论用偏见看待中国反恐》, 载于2014年5月6日《中国国防报》。
- ⑤ David Gitter, “Is China’s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Over?”, May 28, 2016, see from <http://thediplomat.com/2016/05/is-chinas-period-of-strategic-opportunity-over/>; Alan Dupont, “Beijing Must 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 2 FEBRUARY 2016, see from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beijing-must-beware-thucydides-trap>.
- ⑥ Subhash Kapila, “China is the Major Threat to Asi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17 - Jul - 2014, see from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566>.
- ⑦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Periphery Diplomacy”, i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4 (Summer 2014), p. 20.
- ⑧ Katherine Brown, Chris Hensman and Palak Bhandari, “2015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see from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247329.pdf>.

又如,奥巴马曾经说过,要利用网络渗透的手法对朝鲜发动进攻,让“信息”改变朝鲜,最终导致其“崩溃”,其中价值观必定是重要内容。<sup>①</sup>

美国官方非常担心中国的周边外交对于自己价值观攻势的负面影响。2015年,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在其公开报告中指出:中国在人权、透明度和腐败等方面有着糟糕的记录,它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不可能推进类似情况的国家在实现善治上有所进步,而这对于努力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言是一个直接挑战;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只顾自己的外交经济利益,有可能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发展目标,“包括促进民主、人权、治理、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sup>②</sup>美国领导人甚至亲自在周边国家发动基于“平等”、“自由”与“和平”价值观的魅力攻势。例如,奥巴马在2016年5月访问越南的公开演讲中,一边强调人类尊严、自由和法制等价值,一边影射中国对于东南亚和平的负面影响。<sup>③</sup>

在周边地区,日本配合美国,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旗号,以西方普世价值拉拢相关国家孤立中国。2013年12月7日,日本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日本要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和印度等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sup>④</sup>2016年1月19日,安倍再次强调“在亚洲,一个拥抱自由、人权、民主、尊重法治的时代将拉开大幕”,明确表示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携手。<sup>⑤</sup>

(三) 国际社会尤其是精英对于中国国内发展与周边外交政策的误解

除了利益差异、舆论引导和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国外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周边外交存在诸多误解。这一方面出于对中国内政外交的不了解;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的国内问题持续受到关注。一方面,周边国家诸多人士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心存偏见,对中国的人权、宗教和民族等诸多政策有着错误认识;<sup>⑥</sup>另一方面,随着与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中国的教育、环境、腐败、卫生等社会治理问题,以及中国公民在周边国家的行为也受到越来越

越多的关注,稍有不慎就会被媒体放大,造成消极影响。近年来,因中国游客在日本、韩国等地的“海淘”而诱发的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负面评价,就是典型例证。

国外学术界与智库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不了解或肤浅认识更是值得注意。例如,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强调,中国外交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sup>⑦</sup>。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追求软实力最重要的工具是金钱,并评论称“软实力无法买到,只能赢得”,而它对中国的建议则是“放松对国内苛刻的限制和减少对外国舆论的控制”。<sup>⑧</sup>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凯尔·丘奇曼(Kyle Churchman)说:“尽管北京利用他主义的言论表述‘一带一路’倡议,但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中国经济。”<sup>⑨</sup>

### 三、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集体

- ① 李敦球《朴槿惠的“第三条道路”能否融化朝韩关系坚冰》,参见中青在线2015年1月31日,[http://zqb.cyol.com/html/2015-01/31/nw.D110000zgqnb\\_20150131\\_4-04.htm](http://zqb.cyol.com/html/2015-01/31/nw.D110000zgqnb_20150131_4-04.htm)。
- ②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C 2015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15, pp. 415-416 & 474.
- ③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i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Vietnam”, May 24, 2016, see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05/24/remarks-president-obama-address-people-vietnam>.
- ④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7, 2013, p. 23, see from [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documents/2013/\\_icsFiles/afildfile/2013/12/18/NSS.pdf](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documents/2013/_icsFiles/afildfile/2013/12/18/NSS.pdf).
- ⑤ 《安倍欲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拉拢周边国家》,参见中国新闻网2016年1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1-20/7724324.shtml>。
- ⑥ 许利平、韦民《人文交流与经略周边》,载于《世界知识》2016年第1期。
- ⑦ Merriden Varrall, “Chinese Worldview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6, 2015, see from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ese-worldviews-chinas-foreign-policy>.
- ⑧ David Shambaugh, “China’s Soft Power Push”, July/August 2015 Issue, see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6-16/china-s-soft-power-push>.
- ⑨ 《美媒“一带一路”2016年仍将主导中国外交》,参见参考消息网2016年1月14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6/0114/1053002.shtml>。

都非常重视同周边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努力为打破国际封锁和实现国家的发展创造总体有利的周边环境。当前,“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sup>①</sup>。然而,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仍有一些短板,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

(一)中国尚需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清楚周边公共外交的理想追求

过去,面对周边国家的疑虑,中国主要是向他们解释自己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即“不做什么”。现在,中国虽然已经明确了“要做什么”,即建构“命运共同体”,并且开始拿出具体方案,但这背后的理论根源是什么,为何能够成功,中国的解释仍需进一步深化。当前,中国特别注意用“和合共生”的理念强化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强调中国主张尊重不同国家发展多样性与差异性,认为各国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共处、携手合作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学术界还特别指出,“‘和合’是真正具有中国内涵的概念,是根本不同于西方世界观的思想理念”。<sup>②</sup>“共生”则是指中国的发展不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其中包括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帮助他们适应新时代,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发展定位。“和合共生”在理论上能够真正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证明国家之间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将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和价值共享变成可能。<sup>③</sup>这种探索体现了中国学者勇于创新的勇气与智慧。但仍然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假设和逻辑演化的角度阐述清楚“和合共生”何以成为可能,加大以世界历史为基础的详细学术论证,以期让习惯以“欧洲中心观”看世界的外界人士完全信服。

在实践层面,中国特别注意强调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互利互惠能够促进双方的良好认知。但这种思路并未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具体而言,诸多周边国家存在经济上拥抱中国、在安全上指望美国的心态,甚至将中国的周边外交视为用经济手段收买、分化和征服周边地区。这种观点如果长期混淆视听,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声誉。<sup>④</sup>

(二)在文化尤其是价值观方面,中国的周边国家公共外交还存在一些误区

基于历史教训的思维定势影响了中国对于价值观在外交作用中的判断。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

期,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外交,导致了中国与诸多国家关系恶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更加强调务实和稳健,意识形态因素也随之淡化。然而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外交仍有市场。美、日等国正是借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大肆攻击,并试图用西方价值观在中国周边国家中笼络人心。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虽然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外交,但却不太善于针对美、日的意识形态污蔑展开有效反击,在和周边国家人民建构共同价值观方面的工作也稍显滞后。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周边国家经济影响力的进一步壮大和美、日等国影响力的相对式微,他们会更加高调地使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在周边国家的社会中塑造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舆论氛围。对此,如果不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对周边国家的人民解释清楚我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适时寻求双方的共同价值,中国的公共外交将难以改变在这些国家相对被动的局面。

中国在对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上也存在某些认识误区。由于诸多周边国家和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许多人倾向于认为这种文化的亲缘性是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优势。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度要远远低于在文化上与中国不同源的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sup>⑤</sup>个中原因众多,但在文化上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儒家文化在周边国家传播过程中的具体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不同国家对它的理解也发生了差异。因此,只强调传统文化的作用而不重视挖掘其内在精神,不对其做与时俱进的创新,同时不注重不同文明之间

①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参见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②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载于《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

③ 王义桅《以和合共生实现三重超越——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基石》,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6月(下)。

④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Is China’s Soft - Power Bubble about to Burst?”, August 25, 2015, see from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s - soft - power - bubble - about - burst - 13683.

⑤ 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

的沟通、对话乃至融合并建构符合时代背景的新区域文化,周边公共外交自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还需注意的是,宗教在周边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重视。虽然中国的宗教界已经开始重点对周边国家开展一些交流工作,但仍有较大空间,相关功能也需要更深入挖掘。<sup>①</sup>目前,宗教在周边“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的文化中都有着重要地位,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亚、南亚等地区大肆渗透。<sup>②</sup>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三)中国周边公共外交在具体操作层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中国的合作性公共外交呈现出重视东部、忽视西部,偏好大国和中等国家、忽视小国的特征。例如,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东盟、南亚和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规格与层次与中韩和中俄相比,相差很远。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哈萨克斯坦等许多国家目前还没有稳定的双边人文交流机制。又如,在2016年中国出版的最新公共外交发展报告中,俄罗斯、日本和韩国被单独描述,印度被放在“金砖国家”中简略带过,与此同时,东盟、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国家则被忽视了。<sup>③</sup>然而,就大国而言,由于当前安倍政府刻意对华坚持冷对抗的方针,中日关系改进的余地已经不大,再加上中日民间的对立情绪,因此短期内继续加大对日公共外交的投入已经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就小国而言,中国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蒙古以及中亚、南亚等小国的公共外交投入较少,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不大,<sup>④</sup>而这些国家恰恰是当前周边外交必须着力突破的重点区域,投入不足会限制我们目标的实现。

非政府组织(NGO)需要在周边公共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以缅甸为例,早在2012年,该国就已有约1000个相关组织在活动,被称为西方NGO的“天堂”。其中,来自美国、日本和英国的NGO数量最多,资金也最为充裕。虽然许多非政府组织在其政府支持下参与了对缅甸的援助和建设进程,但其中也不乏代表特定集团的战略利益、别有用心组织,密松水电站项目的停滞就与此相关。<sup>⑤</sup>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育还不成熟,尚不能对国家周边形象的塑造起到支持作用。

## 四、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发展路径

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中国应“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执行好“亲、诚、惠、容”的理念,扎实做好周边公共外交在组织、传播和品牌建设方面的具体工作,改变周边公共外交的能力无法匹配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这一情况。<sup>⑥</sup>就具体思路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一)勇于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指明其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

毫无疑问,要想在周边公共外交领域取得突破,打破西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的把持是一个必须突破的环节。中国必须建立起源于自身实践而又属于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

就实践层面而言,当代中国60余年的发展与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差异巨大。中国没有靠对外掠夺和剥削完成资本积累,而是靠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在遵守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规则这一前提之下,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给予了诸多发展中国家以无私的援助,并且欢迎他们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在周边地区更是如此。中国须对周边国家说清楚,这个实践是西方既有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不能解释的。因此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来简单地分析思考中国崛起的过程

① 陈冠桥《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的实践》,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6年第1期;何亚非《宗教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载于《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8期;涂怡超《宗教与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理念、机制与效应》,载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6期。

② 李伟《“伊斯兰国”对我周边威胁不容低估》,载于北京周报网2015年2月5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2009news/tegao/2015-02/05/content\_667564.htm。

③ 赵启正、雷蔚真主编《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192、349—379页。

④ Jeffrey Reeves, “China’s Unraveling Engagement Strategy”,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3, pp. 139–149; Li Hak Yin and Wang Zhengxu, “China’s Advancements in Central Asia”, see from [http://www.eai.nus.edu.sg/publications/files/Vol1No4\\_LiHakYinWangZhengxu.pdf](http://www.eai.nus.edu.sg/publications/files/Vol1No4_LiHakYinWangZhengxu.pdf).

⑤ 孔志坚、雷著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甸的发展及其影响》,载于《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4期。

⑥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载于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与影响无疑是不科学的。

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不能局限于“中国中心”甚或东亚的经验视角,而应当具有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国应该更为深入地探索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为何在东方形成了以相对和平的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与此同时西方却长期陷入彼此征伐的无政府社会并孕育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国际社会观?为何东方的封建社会能够延续数千年,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却能够快速崛起,并且恰好在前者处于衰落时能够取而代之?为何社会主义在西方兴起,而最终却在东方开花结果?同为资本主义,为何欧洲在历经战火后走向一体化,更加强调对文明和规范的敬畏,而美国却依旧欣赏我行我素,偏好“金元”加“大棒”的实用政策,等等。惟有思考上述问题并寻求新的路径,传统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和西方经典的基督教世界观才能找到对话的窗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才能超越东方视角,真正属于世界。

当前,尤其要注意在学理上继续探索并讲清楚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和合共生”何以成为可能,指明它超越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地方。现实主义理论只要绝对收益,不承认国家之间存在共生的可能;自由主义理论虽认可相对收益,但仍然害怕在此过程中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让弱者处于不利;而建构主义眼中的康德主义大同世界观,本质仍然是西方文明的全球化,不承认非普世价值的存在。惟有超越这些理论,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才能真正在文明层面说明中国和平发展的道统,为周边国家所欢迎。

(二)破除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误区,创新文化沟通思维,发展共同价值观

不同价值观的内核各异,其外延和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相同或相通的地方,否则世界的沟通就无从谈起。中国更需注意,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应有自己的价值观,否则中国将无法对周边国家说明自己发展的合法、合理与合目的性。

美、日以退为进的价值观攻势并不能掩饰其外强中干,它们必须正视自身的实际能力。美国的价值观只合适自己,它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注定要遭遇更多反制措施。而日本试图

通过价值观的联系来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来围堵中国,也早已被证明是一厢情愿。对此,中国需要做的不是简单采取对抗思维,斥责其虚伪性和注定要失败的命运,而应超越这个层面。首先,破除自己在文化亲缘性方面的思维定式,对中国的经典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重新加工和整理,在保持其精神内核的和平性、包容性与发展性等特征的同时使之多样化,以便能够更好地为周边国家的人民所接受。然后,应尝试通过组织发展周边国家的文明对话机制、联合反腐机制、人权发展论坛、环境保护基金等多种措施,让拥有不同制度、信仰和文化的各国人民倾情沟通与对话。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努力重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sup>①</sup>,继续挖掘中国梦与亚洲梦相通相融的部分,着力打造周边国家人民所能共有的区域文化,推进周边人文共同体的形成。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周边地区塑造包容性的战略文化,让不同文明在碰撞中相互学习和借鉴、融合与共生,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超越东西方的固有思维局限,发展出一种融中西之长而避其短的新全球文明,并使之站在更高的起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梦的实现。

(三)摆正心态,优化周边公共外交的整体布局,壮大其社会基础

毫无疑问,崛起的中国既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也要经得住外界更为苛刻的审视。在此过程中,中国公民和媒体都必须培育更为自信、包容、坚强和乐观的心态,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善于和外界打交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述好中国特色。对于自己的缺点不回避,积极塑造在发展中谋求进步的正面形象。对于周边国家的了解和疑虑,要有耐心,坚信长期言行一致的坦荡胸襟会赢得理解、支持和尊重。对于对手的恶意攻击,既要坚持原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对国际社会做好舆论解释,主动去

<sup>①</sup>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参见人民网 2015 年 9 月 29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



争话语权,做到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当前特别要做好同国外学术界和智库的交流工作,使其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国情,熟悉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的国际追求。

中国应当继续加大对“一带一路”的公共外交力度。首先,在具体项目上更多宣传共同参与、合作共赢的理念。例如,美国曾经提出过“新丝绸之路”计划,但由于实力有限而不得不束之高阁。对此,中国可以主动提出与之对接,并欢迎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其次,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建设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对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安全与法律问题,可以考虑邀请各国的相关专家、媒体参与相关项目建设的实地调研与考察,表明自己会按照国际机制解决问题的态度,借助他们发出积极声音。面对朝核、钓鱼岛、南海与反恐等周边热点安全问题的指责与炒作,中国的周边公共外交也要强化舆论工作的联动机制,做好协调分工和信息共享,既要对外传递出中国“不惹事、不怕事”的原则,也要对内做好教育工作,防止不理智的极端声音妨碍国家和平发展的大局。另外,中国也应注意加强与相关国家高层在相关议

题上的直接沟通与交流,防止因社会的误解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出现政府的决策为舆论所绑架。

应根据周边外交的整体需要优化合作性公共外交资源的配置。在当前公共外交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将资源优先用于相对容易开展工作且投入小、收益大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小国。当前,特别要注意强化对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中亚等“一带一路”必经国家的公共外交投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该进一步改变主要由政府主导的态势,更多依赖企业尤其是中国自身的非政府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必要时甚至可以考虑将一些官方项目委托给非政府组织,以壮大周边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同时,要引导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活动,逐渐融入当地的人民群众之中,与之建立更为直接与紧密的联系。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文思]